

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

周蓮弟

香港大學中文系

引言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吉州廬陵人。他歷侍高宗(趙構，1107–1187，1127–1162在位)、孝宗(趙昚，1127–1194，1163–1189在位)、光宗(趙惇，1147–1200，1190–1194在位)三朝，是南宋(1127–1279)時期兼通文史的著名大臣。寧宗(趙擴，1168–1224，1195–1224在位)慶元元年(1195)以少傅致仕。¹周必大深諳朝政，熟識國事，每有議論，遂發而為文，「著作之富，自楊萬里〔1127–1206〕、陸游〔1125–1210〕以外，未有能及之者」。他的著述卷帙浩繁，惜開禧(1205–1207)年間首刻的雕本久佚，南宋以後止存抄帙。²而南宋以後，流傳民間的周必大集主要指經過輾轉傳抄，或運用不同的印刷方式製成的各種本子。³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的《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便詳細記錄了各種現存周必大文集的宋刻本、

¹ 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收入吳洪澤(編)：《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刊》(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226；沈治宏：〈周必大年譜簡編〉，載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編)：《宋代文化研究》第3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302。

² 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集部四·別集類三〉，〈提要〉(以下稱《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2上(總頁1，2)。

³ 討論古籍版本與版本學的著述甚豐，筆者主要參考崔富章：〈論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學學報》第18卷第4期(1988年12月)，頁84–92；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0年)；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明(1368–1644)鈔本和清(1644–1911)鈔本等各種本子或殘本。⁴現存筆者可見，卷數完整而文字清楚可讀的周必大文集主要有以下兩個版本：

- 一、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的《文忠集》二百卷，另有年譜一卷和附錄四卷，筆者稱為《庫本》。
- 二、歐陽棨瀛塘別墅藏板的《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及附錄五卷。道光二十八年(1848)歐陽棨先把正文一百六十二卷和年譜一卷付梓(筆者稱之「道光本」)，尚餘雜著述二十三卷、書稿十五卷、附錄五卷未刊。⁵咸豐元年(1851)他再將未刊稿續刊(筆者稱之「咸豐本」)，其與已刊稿合成正文二百卷、附錄五卷和年譜一卷的《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筆者稱為《瀛本》，以此包括道光本與咸豐本)。⁶

鈔帙在輾轉傳鈔下流傳下來，少數藏書家保存了卷數完整的文集，但更多是僅搜求到殘卷斷篇。周必大親睹四朝政壇變幻，熟悉政策利弊，其著述是研究南宋史課題的重要資料，這點自不待言。筆者細心整理藏書家的藏書目錄和他們為珍藏的文集撰寫的序與跋等零星的資料，窺探周必大集原刻本和流傳後代的鈔帙在內容、版式、刻印、流傳等方面的概況。本文的要旨在於探討不同鈔帙輾轉傳抄的情況跟《庫本》和《瀛本》的關係，以求對現存周必大集的兩個主要版本的背景和編纂情況有一較確切的認識。⁷

周必大《文忠集》概說

名稱

周必大文集的名稱，各家說法不盡相同。《宋史·藝文志》亦只記錄各種著作的名稱，而著作包括《詞科舊稿》三卷、《掖垣類稿》七卷、《玉堂類稿》二十卷、《政府應制稿》

⁴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頁222–24。

⁵ 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咸豐元年鑄瀛塘別墅藏板，以下注文簡稱《瀛本》)，《承明集》卷後，歐陽棨：《續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

⁶ 詳參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集部上·宋別集類〉，頁57；《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頁223–24。

⁷ 筆者撰畢此文後大半年，喜於2000年8月在香港的書店購得祝尚書撰的《宋人別集敘錄》上、下兩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書中亦有介紹現存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的版本背景。是書敘說了自南宋至清，不同的藏書家曾收藏周必大集鈔本的概況，又略說了晚清歐陽棨等重刊周必大集的背景(卷二十，頁984–91)。這方面的解說，筆者本篇的討論與是書作者的敘說基本上並無差異。為便讀者參考，特此說明。

一卷、《歷官表奏》十二卷、《省齋文稿》四十卷、《別稿》十卷、《平園續稿》四十卷、《承明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雜著述》二十三卷、《書稿》十五卷、《附錄》五卷。故此，筆者臆測，周綸為父親周必大編刊著作時並未為各種著作給予一全集的名稱。不過，《宋史·周必大傳》卻因周必大晚年自號「平園老叟」，遂稱其文集為《平園集》。由於南宋時廖行之、蘇思恭、吳獬等人的文集皆以「省齋」為名，而周必大《省齋文稿》的續編又以《平園》命名；為了避免混淆，元代(1271-1368)馬端臨(約1254-1323)的《文獻通考·經籍考》便以《周益公集》作為周必大著作的總稱。⁸

明代的藏書目錄顯然參考了《文獻通考》所用「周益公集」的稱號。如明代楊士奇(1365-1444)等編的《文淵閣書目》稱「周益公文集」；趙琦美(1563-1624)編的《脈望館書目》則稱「周益公集」。清代四庫館臣編《四庫全書》時，沒有用《宋史·周必大傳》的「平園集」，亦不採《文獻通考·經籍考》的「周益公集」，而是命名為《文忠集》。清人顧修彙刻書目時則稱之為《周益公大全集》。彭邦疇(嘉慶十年(1805)進士)的重刊序稱之為《周益文忠公集》，⁹而王贈芳(1782-1849)的後序、歐陽棨的重刊後序和續刊敘略改稱之為《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¹⁰本文討論《庫本》與《瀛本》的版本流傳與兩本的關係，為便於書寫和避免混淆，除了本文題目及副題採《文忠集》一名，在沒有指明討論哪一版本時，文中一律稱作周必大集。

⁸ 脫脫(1314-135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二百零八〈藝文志七〉，頁5377；卷三百九十一〈周必大傳〉，頁11972；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二百四十〈經籍考六七·集·別集〉，頁1903；《瀛本》，卷首，歐陽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

⁹ 馮惠民、李萬健等(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90，1460；《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總頁1)；歐陽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道光二十八年鐫瀛塘別墅藏板(以下注文簡稱《瀛本》)，卷首，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

¹⁰ 《瀛本》，卷首，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與歐陽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附錄卷5後，〈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頁1。彭邦疇與歐陽棨在此篇後有案語表示獨見序的前半篇，未及全篇，故未知作者是誰。二人身故後，陸心源(1834-1894)的《皕宋樓藏書志》裏輯錄了宋賓王為《周益公集》寫的跋，末後也有謝浦泰的跋。據陸心源在「周益公文忠集」條下記錄，這本文集由宋賓王校訂、謝浦泰抄錄。細心翻閱和比較兩篇文章，筆者發現除了文字上有一些差異外，在內容上，僅存半篇的〈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與宋賓王寫的〈跋〉的前半篇十分相似。筆者相信兩篇文章應來自同一篇文章，不過在轉輾傳抄的過程中，文字上「類多舛謬，或槩本字跡蠹落，間有缺失」。見陸心源撰：《皕宋樓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首〈例言〉，頁2下(總頁3)。對於彭、歐二人所指未知作者是誰的問題，筆者認為那半篇序應該是宋賓王所撰的跋，但他倆無緣親睹全篇，陸心源卻有緣搜求到記錄較豐富的跋文，資料上大大補充了只有半篇的〈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宋賓王〈跋〉，頁11下至15上(總頁962-63)。

種類與卷數

現存可見周必大的著述，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稱《四庫提要·文忠集》)的記載，共有二百卷。全集包括《省齋文稿》四十卷、《平園續稿》四十卷、《省齋別稿》十卷、《詞科舊稿》三卷、《掖垣類稿》七卷、《玉堂類稿》二十卷、《政府應制稿》一卷、《歷官表奏》十二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七卷、《承明集》十卷、《辛巳親征錄》一卷、《歸廬陵日記》一卷、《閒居錄》一卷、《泛舟遊山錄》三卷、《乾道庚寅奏事錄》一卷、《壬辰南歸錄》一卷、《思陵錄》一卷(包括上、下卷)、《玉堂雜記》三卷、《二老堂詩話》二卷、《二老堂雜誌》五卷、《唐昌玉蕊辨証》一卷、《近體樂府》一卷、《書稿》三卷、《筓子》十一卷、《小簡》一卷。另有《年譜》一卷和祭文、行狀、謚誥、神道碑等別為附錄四卷。清道光十二年(1832)，彭邦疇在《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謂：「《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四庫全書》的書目作二百零四卷，蓋合《思陵錄》上、下二卷為一卷，而附錄止作四卷故也。」王贈芳在《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中說：「益公的《平園集》二百卷藏於內府。」《記鈔周益文忠公集始末》亦言：「《周益公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¹¹ 故此，全集共有二百卷的卷數應是正確的。

就書稿的種類而言，《四庫提要·文忠集》記錄《文忠集》共有書稿二十七種之多，不包括周綸的《年譜》，這數目跟《提要》羅列的書稿數目也是相稱的。陸心源在《儀顧堂題跋》的「宋槧周益公集跋」條說：「《周益文忠公集》二十七種，今存七種，及附錄，首行題各種之名，下題《周益文忠公集》第幾宋刊宋印本。」陸心源不但指出書稿的類別有二十七種，還道出他當時仍親見殘留的七種宋刊宋印本的書稿。據他的記錄，清初徐乾學(1631-1694)傳是樓有抄帙全部，及後全帙歸王聲宏。宋賓王後來有機會拜見王聲宏，「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七種」。¹² 故現存的《庫本》與《瀛本》內的二十七種書稿也應跟南宋原刻本的書稿種類相同。

南宋原刻本概況

周必大的著作由嗣子周綸手訂，《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周益國公全集二百卷」條載周綸在開禧二年(1206)中秋寫的跋。他在跋中記錄：

¹¹ 《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至2上(總頁1-2)；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附錄卷五後，頁1。

¹²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與丁丙[1832-1899]《善本書室藏書志》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十二，頁1上(總頁143)；《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宋賓王《跋》，頁12下(總頁962)。

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與先友免解進士曾無疑三異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進士許志伯凌、鄉貢進士彭清卿叔夏、羅次召克宣，相與覆校，敬鋟木以傳。惟日記自紹興戊寅〔二十八年〕訖嘉泰甲子〔四年〕，紀錄頗詳，而書稿尤多，皆未容盡刻，實〔應是「寶」字之誤〕藏惟謹，當俟他日。¹³

周綸的跋沒有說明何時開始編纂工作。然而，跋既寫於開禧二年中秋，則首次編纂完成並在開禧二年付刻的文稿，最遲應在此年中秋前完成。《四庫提要·文忠集》簡介周綸「以家嘗刻《六一集》，故編次一遵其凡例」。由此估計，周綸開始手訂周必大著作的時期，最早可推斷在周必大編刊歐陽修《文忠集》完成之後，即慶元二年後。¹⁴ 既然周必大的著作在開禧二年付刻，筆者稱這個初刻本為「開禧初刻本」。到底當時刻印了多少卷？版本學家顧廣圻(1766-1835)在《思適齋集》的〈周益文忠公文集跋〉記載：

首列《周益文忠公文集·總目》：凡《省齋文稿》三十卷、《平園續稿》三十九卷、《玉堂類稿》十三卷、《政府應制稿》一卷、《歷官表奏》五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四卷、雜著述七卷、書稿十四卷，共百二十五卷，又附錄五卷、年譜一卷。總目末有開禧丙寅〔二年〕嗣子綸所書，言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¹⁵

黃丕烈《百宋一廬書錄》的「周益公集」條記錄了他搜尋到宋刊宋印本的殘本六十八卷，而對開禧初刻本的版式有如下簡略的記載：

《周益公集》宋刻罕有。余所收得殘本，有《省齋文稿》一至八、二十八至三十六；《平園續稿》一至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三十六至四十；《玉堂類稿》六至八、十一至十三、《歷官表奏》一至五、十至十二；《承明錄》一至六；《書稿》九至十一；附錄五卷，其〔疑是「共」字之誤〕六十八卷，幾得三分之一，疏行大字，與《歐陽修集》板刻悉同，蓋仿而為之者。¹⁶

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志》基本上從《百宋一廬書錄》抄錄了黃丕烈搜集到的殘本卷數，但將總數六十八卷更正為六十九卷，於條目前起題為「《周益文忠集》殘本六十九卷宋刻宋印本」。¹⁷

¹³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集部〉，頁9上(總頁752)。

¹⁴ 《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總頁1)；歐陽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2。

¹⁵ 顧廣圻：《顧廣圻書目題跋》(與黃丕烈〔1763-1825〕《黃丕烈書目題跋》合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十五〈題跋二〉，頁18下至19上(總頁569-70)。

¹⁶ 黃丕烈：《黃丕烈書目題跋》，頁48下(總頁433)。

¹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頁15上至16下(總頁964)。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周蓮弟

依此而言，開禧初刻本的卷數大概有一百廿五卷，另有附錄與年譜；而餘下未能同時刻印的還有大量遊記、雜錄和書稿，其中包括《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等十一卷。據《四庫提要·文忠集》記載，「鄭子敬〔？-1237〕守吉時，募工人印得之，世始獲見完書〔筆者稱之為『鄭寅續刻本』〕」。鄭子敬原名鄭寅。他是參知政事鄭僑（乾道五年〔1169〕進士第一）之子。鄭寅以父蔭入仕，歷知吉州，為人「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雖然周必大文集「昔時固有版本矣，然自宋至今迄少傳刻」。¹⁸鄭寅卒於嘉熙元年（1237），而《四庫提要·文忠集》記錄鄭寅把周綸未付梓的文稿刻印。如是而言，筆者估計，大抵最遲到南宋理宗（趙昀，1205-1264，1225-1264在位）嘉熙年間（1237-1240），開禧初刻本與鄭寅續刻本仍可完整保存（筆者合稱「南宋原刻本」，也就是周必大集二百卷的原刻本）。

陸心源從殘本的版式，窺見南宋原刻本的版式有這樣的一些特徵：「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大題在下，事涉宋帝皆空一格，亦有空二格者，即〈百宋一廬賦〉中所謂披益公而疏行者也。」¹⁹董康（1867-？）編撰的《書舶庸譚》記錄了他訪求得宋刊《周益文忠公集》的殘本。他對殘本的版式有較具體的形容：

宋寧宗以後，刊本每半葉十行，大小俱十六字，左右雙邊。存《省齋文稿》目錄兩冊、卷一至卷八、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六。《平園續稿》序（徐誼）目、卷一至卷十五、卷二十至卷三十、卷三十六至卷四十。《玉堂類稿》卷六至卷八、卷十一至卷十三。《歷官表奏》目錄二十六葉、卷一至卷五、卷十至卷十二。《承明集》目錄兩葉，卷一至卷六；《書稿》卷五、卷九至卷十一。附錄五卷（前缺八葉），共七十卷。每卷首行類目在上，總目在下。如《省齋文稿》卷第一〔原文此處有闕文〕《周益文忠公集一》之類。卷尾題同首行，板心上紀字數，魚尾下〔疑有闕字〕某種幾下，魚尾下紀葉數，並刻姓名。如胡昌、胡彥、鄧振昌、胡元、蔡懋恩、懋〔疑有闕字〕劉宗等。宋諱避懸、徽、樹、慎、廓等字。有汪士鐘，汪士鐘印，三十五，峰園主人趙宋本諸記〔「有汪士鐘……本諸記」一句疑有闕字〕。²⁰

¹⁸ 《四庫提要·文忠集》，頁2上（總頁2）；鄭岳（輯）：《莆陽文獻》，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傳記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黃起龍刻本，1987年），〈列傳二十六·鄭僑〉，頁1上、5上（總頁258，260）；彭邦嘯：〈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

¹⁹ 《詔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頁15上至16下（總頁964）。

²⁰ 董康（編撰）：《書舶庸譚》（上海：誦芬室，1939年），卷八下「殘本周益文忠公集四十冊」條，頁8。

他的記錄跟以上兩條資料相當類似，但提到的卷數略多，對殘本的資料也描述得較清楚。筆者臆測董康所見的殘本正是黃丕烈所藏的宋刊殘本。董康記述殘本有汪士鐘印，他收到的宋刊殘本應來自清初著名藏書家汪士鐘的藝芸書舍。不過，董康點算卷數亦有誤，卷數應是七十七卷。此外，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的「周益公文集二卷宋刊殘本」條也簡單記錄了宋刊本的版式：「二卷為全集中《書稿》一種，題下注明紀年，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敦』、『徵』字有關筆，板刻楮印，俱極精善，惜未得全本也。」²¹ 綜合以上零星的記錄，對於南宋原刻本的版式，筆者歸納得以下幾點特徵：

一、每卷首行類目在上，大題在下，小題下注明紀年。如：

省齋文稿卷第一(首行上)

周益文忠公集一(首行下)

二、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

三、木刻楮印。左右雙邊，版心有字數。魚尾下紀葉數和刻工姓名。

四、事涉宋帝皆空一格，也有空二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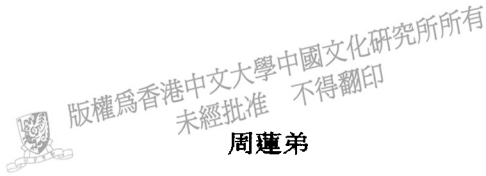
周綸沒有把周必大所有的著作付梓。他在開禧二年(1206)撰寫的〈跋〉便解釋未能同時將文稿盡刻的原因是「書稿尤多」，故要「實〔寶〕藏惟謹，當俟他日」。陳振孫(1183-?) 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卻認為《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十一卷所言，多及時事，故託詞未刊。²² 無論原因是書稿浩繁，未能同時刻印，還是緣於一些涉及時事的內容不便於當時付梓，筆者以為經費、技術與政治環境的限制等因素，皆與書稿未能盡刻有關。

據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的記錄，「是書自開禧後無重刊，故宋本流傳極少，卷帙既重，雖抄本亦往往不全」。換言之，南宋原刻本幾已散佚，亦未有重刊。周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溫雅，文體昌博，為南渡後臺閣之冠」。何以南宋原刻本沒有重刊？筆者以為「卷帙既重」應是原因之一。〈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記錄：「《周益公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凡一百三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世鮮全本。藏書家稍見殘篇蠹餘，亦必購求藏貯。」²³ 周綸以書稿浩繁來解釋沒有把父親的所有文稿付梓，也是合於事理，非純是掩飾之辭。

²¹ 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光緒丁酉〔1897〕誦芬堂刊本)，卷二十一，頁13。

²²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集部〉，頁9上(總頁752)；《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至2上(總頁1-2)。

²³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十二，頁1上(總頁143)；《四庫提要·文忠集》，頁1下(總頁1)；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關於周必大集與附錄的卷數，歷來並無爭議，但對於全集的字數，不同的記載卻有甚大的差異。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室把彭元瑞手校的周必大集製成微捲貯存。是書在卷一百六十九後有〈記鈔周益公集始末〉上半篇，其所記字數為「一伯五十四萬五千餘言」。由此推知，《瀛本》編校者從彭本抄錄此半篇時，誤把「五」作「三」。另外，《函宋樓藏書志》所載宋賓王為《周益公文忠集》撰的〈跋〉



周蓮弟

周綸沒有同時把所有書稿付梓的另一關鍵或與不易籌得足夠資金刊刻浩大的文集有關。彭元瑞(1731-1803)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參與總理《四庫全書》編纂事務的副總裁之一，²⁴ 他為周必大集寫題記時憶述：

吾鄉大族多醜金為宗祠，又刻其先聞人文集，日祠堂版，若六一〔歐陽修，1007-1072〕、南豐〔曾鞏，1019-1083〕、山谷〔黃庭堅，1045-1105〕、澹菴〔胡銓，1102-1180〕、象山〔陸九淵，1139-1193〕、文山〔文天祥，1236-1283〕諸集皆有之。惟益公、誠齋〔楊萬里〕、盤洲〔洪适，1117-1184〕三集最巨，無雕本。歲辛卯〔乾隆三十六年(1771)〕，從吳估鈔得此本〔即《周益公集》〕，寫手諂舛特甚。越二十年，庚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內府本細校，纍可讀。²⁵

彭元瑞說「三集最巨，無雕本」，按理這並非指三集沒有雕本。如周必大的著作是先後在開禧及嘉熙朝分批刻印，但原刻本已佚，此後至道光末年歐陽棨將文稿重刻之前，確無雕本。據他的憶述，文集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從吳郡商人購得的《周益公集》。彭邦疇在寫於道光十二年的〈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中，記錄了祖父彭文勤公(即彭元瑞)購得由眾人鈔成的《周益公集》舊鈔本時的經歷：

先文勤公嘗購得影宋本，乃合眾人鈔成者，紙墨行式紛錯不齊，幸卷帙俱備。嘗借內府本手校一過，因慨然於江西諸大家文集，多祠堂版，而公集日就銷沉。欲俟駕堂太史與其族人謀之。其文具載於〈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中，然亦僅勘定訛字而未暇編次，故跋中但曰：「粗可讀而已。」²⁶

〔上接頁69〕

記載：「《周益公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九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頁11下〔總頁962〕)筆者粗略計算現存《瀛本》和《庫本》的字數。《瀛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四字，全集合共四十冊，平均每冊約七十五頁，全集字數合計約一百四十四萬字。為方便核算字數，筆者採用商務印書館據《四庫全書》珍本影印的版本。全集共分二十冊，每半葉八行，每行廿一字，平均每冊約二百頁，全集字數合計約一百三十四萬四千字。〈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所抄錄的字數跟以上計算所得的結果顯然比較接近。故此，筆者以為字數的差異，或出於陸心源撰《皕宋樓藏書志》時抄錄宋賓王的跋所產生的誤抄，又或是跋文的資料也是輾轉抄錄而來，而資料本身已存在了抄錄上的錯誤。如是而言，「九」應為「一」之誤。

²⁴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01-2。

²⁵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標點善本題跋集錄》集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2年)，上冊，別集類，頁540。

²⁶ 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據歐陽棨在道光二十八年寫的〈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的記錄，彭元瑞所藏的益公文集是知聖道齋本。參歐陽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

由此可見，江西諸家文集的刊印是依賴祠堂中族人合資籌劃辦理的。周必大集多達二百卷，刊印經費之巨大自不待言，難免「日就銷沉」。影宋本是指依照宋版影刻的本子，彭氏所購的應是抄自這影宋本的鈔本。²⁷

四庫館臣甄選的《庫本》

南宋原刻本的「雕本久佚，止存抄帙」，周必大的後裔亦沒有對抄自原刻本的鈔本作一記錄。舊鈔本在坊間輾轉傳遞或傳鈔，由是各種鈔本迭出，「名目卷第，多寡先後，無一相同，蓋出於後來刻本」。不過，大部分的鈔本不但是卷帙殘缺不整，而且在互相傳鈔下，內容「訛誤踳駁」。²⁸現存可見的宋刻宋印本也僅是殘卷斷篇，於是《庫本》與《瀛本》便成為可資參考和研究的兩個主要版本，周必大著作的全貌因而得以完整保存下來。兩個全集的編纂背景和過程都經歷了一段迂迴曲折而又頗不相同的歷程，而二者採用的舊鈔本卻又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庫本》的甄選過程

康熙十九年(1680)，武英殿奉旨設立修書處，由內務府大臣總其成，而武英殿便成為在內務府管轄下一個專門修書刻書的機構，其所刻之書稱為內府刻本。內府刻本的書籍實際上也包括了各殿、院、司、局，以至各部、署、監、館等機構所刻之書，這類書也統稱內府刻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高宗(1711-1799, 1735-1795在位)開館編纂《四庫全書》，內府所藏的前代舊書和清歷朝皇帝敕令纂修的書籍，都被集中到翰林院的西齋房，由總裁指定纂修官專職辦理。當時翰林院要辦理內府書籍和存放於翰林院典籍府的《永樂大典》中輯得的佚書，而私人呈獻及官員搜訪到的書籍的校閱工作則在翰林院的寶善亭內進行。²⁹

載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文忠集》二百卷與附錄五卷應來自翰林院寶善亭，而翰林院西齋房的書稿又是來自內府。四庫本《文忠集》被收入翰林院前它的來歷又如何？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清高宗下諭內閣傳令各督撫於半年內購訪遺書。³⁰對於清廷蒐集得的周必大集的諸種鈔本，《四庫採進書目》有以下四種鈔本的記載：

²⁷ 《校讎廣義·版本篇》，頁264。

²⁸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顧廣圻：《顧廣圻書目題跋》，卷十五〈題跋二〉，頁18下至19上(總頁569-70)；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2。

²⁹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編著)：《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李致忠〈序〉，頁7；《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123-24。

³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頁67-69。

- 一、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記錄《周益公集》(二百卷)三十二本
- 二、浙江省第四次鮑士恭呈送書目記錄《周益公集》(二百卷)三十二本
- 三、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記錄《文忠集》(二百五卷)三十二本
- 四、江西巡撫海第四次呈送書目記錄《周文忠集》(二百卷)〔十二套〕六十四本³¹

此外，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與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分別記錄了《周益國公全集》二十五種二百卷(抄本)和《周益公集》二百卷(知不足齋寫本)。³² 估計來自這兩個簡目的兩條資料應與上文引錄《四庫採進書目》所載的第一、二項相同。由此推斷，清廷徵求遺書時，最少蒐集到四種鈔本。彭邦疇記錄祖父彭元瑞曾借內府本校證所購得的舊鈔本，可惜沒有說明是哪一個鈔本。

幾種鈔本中，四庫館臣採用了哪一個鈔本？關於第一個鈔本，筆者見李盛鐸(1859-1937)撰的《木犀軒藏書書錄》中有「《周益文忠公集》殘本四十五卷」條，而題後有校補文字指出僅存的殘本四十五卷是舊抄本，也是《四庫全書》底本。李盛鐸在同條下記錄了鈔本的版式和卷數：

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小題在上，下題《周益文忠公集》卷幾。存《省齋文稿》卷十八至三十一(集十八至三十一)；《平園續稿》卷三十二至四十(集七十二至八十)；《掖垣類稿》卷三至七(集九十六至一百)；《玉堂類稿》卷十至十四(集一百十至一百十四)；《歷官表奏》卷一至十二(集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三十三)。集中宋諱有書「御名」者，或從宋本傳錄。書中勾勒夾籤甚多，封面填寫書手姓名，蓋《四庫》底本。書衣並有「江蘇巡撫採進備選書籍」楷書朱記。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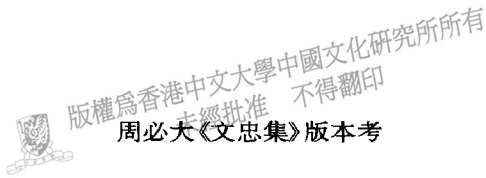
這四十五卷殘本是從甚麼刊本抄錄而來？李盛鐸以卷中宋諱有書「御名」者，疑殘本內容或抄錄自宋刊本。³⁴ 書衣的「江蘇巡撫採進備選書籍」一語表示了這部書是由江蘇巡撫在地方搜訪到後進呈朝廷的採進本。這個舊鈔本成為了四庫館臣纂修《四庫全書》所用的備選「底本」。鈔本可能是仍流傳於地方的宋刊本鈔本，四庫館臣或有參考這個鈔本，不過李氏所藏殘卷中的書衣僅表示這鈔本是從江蘇巡撫採進的「備選」書籍，四庫館臣其實並沒有把這個鈔本選入《四庫全書》。

³¹ 楊家駱：《四庫全書概述》(臺北：中國辭典館復館籌備處，1971年)；《四庫採進書目》，1921年商務印書館據涵秋閣鈔本排印，收入《涵芬樓秘笈》第10集，頁11，55，94，162。

³² 《四庫全書概述》，〈附錄〉，頁224，282。

³³ 李盛鐸(撰)、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書錄〉，頁297。

³⁴ 宋代的刻書有避諱的習俗，尤其在官府刻書上，有不少避諱字。每遇上當朝皇帝的御名，避諱的方法多以鐫刻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回避。見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頁106。



清廷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時，敕令館臣將藏書家姓名附載於所錄書的書名下，以示獎勵。觀《四庫全書總目》所錄《文忠集》二百卷之下附載了「浙江鮑士恭家藏本」一語，這便清楚顯示了四庫館臣甄選了鮑氏所呈獻的家藏本，³⁵此即《四庫採進書目》提及的第二個鈔本，也就是知不足齋藏本。至於第三、四項的兩個鈔本，惜仍未找到相關的資料。

四庫館臣挑選了鮑氏的家藏本必然有其理由。浙江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間向四庫館奏書十二次，所呈藏書的總數為全國之冠，而且頗多善本。清高宗徵求遺書詔頒佈後，杭州藏書家、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1728–1813或1814)在同年四月吩咐兒子鮑士恭檢出家藏書六百二十六種向浙江學政王杰(1725–1805)提交，由他轉呈四庫館。清初數十個獻書家中以鮑廷博的獻書最豐富。他的藏書以子、集兩部最多，故所獻書亦集中為子、集類書籍。知不足齋藏書樓貯藏了不少宋元刊本，其中便包括了鮑氏得自蘇州的宋刊殘本《周益公書稿》兩冊。兩冊殘本後為嚴元照芳椒堂所得。³⁶由此可知，鮑氏曾收藏最少兩個周必大文集的鈔本，一個是殘本兩冊，一個是卷數齊全、文字較準確的鈔本，即《四庫全書總目》提到的那個家藏本。

《庫本》與翰林院本

乾隆四十九年(1784)底，內廷四閣(即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的《四庫全書》修纂完畢。按清高宗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頒的詔令，各省的藏書，除了要給銷燬的書籍外，餘下皆須重歸呈獻之家。然而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朝廷從各省蒐集得的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書籍裏，只有三百九十種書籍獲發還。鮑廷博為了刻書，將部分藏書賣出，賣出的宋元刊本多為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鐘藝芸書舍購入。乾隆五十六年(1791)，知不足齋又因遇上火災而散失了部分藏書。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年間，書齋的藏書已全部散出，其中散出的鈔校本又多歸入仁和勞氏(即勞不甫與勞季言)和吳興陸心源的皕宋樓等。³⁷到底《文忠集》鮑氏家藏本給貯存

³⁵ 鄭偉章：《書林叢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1；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一百五十九〈集部·別集類一二〉，頁1369。

³⁶ 顧志剛：《浙江藏書家藏書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41–44；《四庫全書概述·附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簡目·原序〉，頁204；《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浙江巡撫三寶奏鮑士恭等五家呈獻遺書等事摺〉，頁97–98；同書，〈諭內閣賞鮑士恭等《古今圖書集成》周厚堉等《佩文韻府》各一部〉，頁211；《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184–85；洪煥椿(1921–1989)：《浙江文獻叢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29；《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187。

³⁷ 《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150–53，191；《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626，636–38，642–43，676–80；〈江蘇巡撫楊魁奏遵旨查辦解京書籍應燬應還情形摺〉，頁679；《浙江文獻叢考》，頁129；《浙江藏書家藏書樓》，頁187。



於翰林院，還是發還鮑廷博後，因以上的因素而散失或賣給其他藏書家？筆者推斷，既然道光年間王贈芳可從翰林院借得所藏《文忠集》，並據以校證其他舊鈔本，《文忠集》鮑氏家藏本應仍然貯存於翰林院，並沒有發還鮑廷博。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高宗頒詔在四分《四庫全書》(即貯於四閣的《四庫全書》)抄錄告竣後，「令照式再鈔一分，貯於翰苑，既可備耽書之人入署就閱」。³⁸不過，四庫館總裁已難於再耗人力物力抄寫《四庫全書》，「且傳寫易訛，雖篇幅可得整齊，而點畫未免淆混」，遂於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建議不再另抄副本，在文溯、文源、文津三閣分書完竣後，直接將底本彙存翰林院，作為別本。³⁹由是而言，翰林院藏貯的已經錄入《四庫全書》的書籍，其實是清廷從各地蒐集得的各種藏書的原本。



《瀛本》的編校過程

《瀛本》刊刻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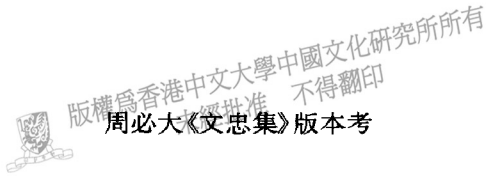
歐陽榮等人耗費人力物力重刻周必大集，固非出於偶然。刊刻的背景應該從周必大為歐陽修編訂全集一事談起。歐陽修著述的卷帙之多，實可與周必大相媲美。南宋時，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在流傳過程中，便因為「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文集不但「行世既久，脫落昏訛，至不可讀」，不同地區所見的全集，其文字皆見歧異。「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劉敞，1019-1068〕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即使是家鄉「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周必大「平生願慕歐陽子，歷官得謚，亦復相類」，遂會同郡人老於儒學的孫謙益、博覽群書而尤長於考證的丁朝佐，搜求舊本，再與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二年〕春迄慶元丙辰〔二年〕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⁴⁰周必大對編校工作的態度一絲不苟：

《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眾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迴然

³⁸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多羅質郡王永瑑等奏請將《四庫全書底本》彙交翰林院收貯摺〉，頁1951-53；又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174-92。

³⁹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諭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著發還本家及全告竣後別繕一分貯之翰林院〉，頁682-83。

⁴⁰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集部(臺北：中央圖書館，1994年)，第1冊〈別集類〉，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跋〉，頁325；同書，王臣：〈歐陽文忠公集跋〉，頁325；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2。



不同，則收置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據依，或不必要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惑。⁴¹

對於周必大等人「六閱寒暑」編校歐陽修全集完畢，其「改覈之精，編次之審」，王贈芳便讚揚「《六一集》經益公編次，最為詳確」。儘管讚揚中有溢美之詞，歐陽榮強調此為重刻周必大集的緣起。他不但自稱「念公校先文忠集之勤」，王贈芳更形容他「嗜學而勇於義，亟欲求公集版行」，「以答昔年編校之勤」，俾償報恩之願。周必大集是「宋人文集中最為難得」的巨著，能將它重刻刊行更加是一種榮譽。⁴²

《瀛本》使用的三大舊鈔本

歐陽榮等人在他們的序中表達了「兩文忠之精神後先契合，久而不磨，又若環相為報」的心願，遂在道光初年陸續搜求仍然存世的各種周必大集的鈔本。他們訪尋了以下幾種舊鈔本。第一種鈔本來自張淳仁(1754–1834)。張淳仁在重刊序中記錄了他守南昌時，得悉都中有殘本，「適常熟言太守朝標入都過訪，屬其轉購，竟購得之，為蕉林相國家〔梁清標(1620–1691)]藏鈔本」。筆者稱此部周必大文集的鈔本為「張本」。此集原裝三十冊，內缺九冊，計三十九卷。卸任前夕，張淳仁將鈔本攜來讓顧廣圻考覈。顧廣圻鑑別後認為鈔本正是抄自南宋原刻本，即周必大家刻本的抄本，其原貌與當時流傳的鈔本二百卷迥不相同。歐陽榮遂請吉郡太守劉梅坪致信張淳仁，表示願意託其戚友陳春仁將這部鈔本付梓。然而鈔本「蕪雜多訛闕」，歐陽榮與王贈芳需要再另找善本重刊。⁴³

第二種鈔本是彭邦疇的家藏本。彭氏的祖父彭元瑞在乾隆三十六年從吳郡商賈買來《周益公集》，但「寫手譌舛特甚。越二十年，庚戌，以內府本細校，纔可讀」。彭邦疇對此家藏本亦有類似的記錄。他說祖父的題跋，「其文具載於《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中，然亦僅勘定訛字而未暇編次，故跋中但曰：『粗可讀而已。』」這正指彭元瑞用內府本校訂文集一事。筆者簡稱彭元瑞購得的舊鈔本為「彭本」。彭本成於眾人之手，從紙張、字體到版式都各不相同，而且訛誤、缺漏的情況屢見。儘管經過校訂，

⁴¹ 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跋〉，頁325。

⁴² 歐陽榮：〈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2；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2；《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謝浦泰〈跋〉，頁15上(總頁964)。

⁴³ 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瀛本》，卷首，張淳仁：〈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序〉，頁1。顧廣圻《思適齋集》的〈周益文忠公集跋〉對張淳仁數收藏了舊鈔本的事也有相近的記錄：「此本〔南宋原刻本〕舊抄有真定梁蕉林相國名印，尚是文中家刊，洵可寶也。今藏陽城張古餘觀察與古樓，道光四年〔1824〕六月，出以相示為考覈，而書於帙端。」見卷十五〈題跋二〉，頁19上(總頁569–70)；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歐陽榮：〈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

但正文中增補與刪改的地方處處可見，原文與改正的文字混在一起，頗見凌亂，實在難以作參考之用。⁴⁴

第三種鈔本是翰林院本。⁴⁵張本「蕪雜多訛闕」，而彭本才「粗可讀」，故有必要多找一部完整的鈔本輔助編校。適逢王贈芳供職史館，借得藏於翰林院的鈔本，於是展開分冊繕錄的工作，但未幾因公職出門而未能卒事。⁴⁶由於蕪林藏鈔本諱缺處不少，歐陽榮惟有寫信彭邦疇商談借其祖父彭元瑞所藏的影宋本。王贈芳及後持書到張邦疇家，借得彭家的藏本，並用以與所借的翰苑本合校。彭本於是成為歐陽榮等人據以重編周必大著作的善本，而翰林院本便是另一主要的參考本，次及張本。除了歐陽榮、彭邦疇和王贈芳外，參與鈔錄工作的人包括新城周貞木太守與泰和周夢巖學使，還有彭邦疇的門人武寧張伯眉。道光十一年(1831)，他們取翰林院本與彭本互校，進行複雜而艱巨的訂訛與補闕工作。道光十二年十月，改訂鈔寫完畢，全集通計二百卷，另備年譜一卷和附錄五卷。彭邦疇將文稿鏤版郵寄歐陽榮，既見重刊在望，歐陽榮「喜獲全書，不揣固陋，匯數本之異同，參互鈎稽，訂訛補缺」。他更雀躍自許經他再改訂的書稿「較之諸本，差為完善」。⁴⁷他所言的「數本」自然是指彭本、翰林院本和張本。

彭本的編校背景和過程

對於《瀛本》的編校者，張本訛闕嚴重；而翰林院本是從官方借來的鈔本，不便長期借用；於是資料堪稱齊備、文字尚可閱讀的彭本，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編纂周必大集

⁴⁴ 《標點善本題跋集錄》集部，上冊，別集類，頁540；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上文注23已提及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室把此本製成微捲貯存。原書為線裝本，共32冊，卷首有彭元瑞的題記、全集總目，而全集中一些卷帙較多的書稿在卷首附有小目。

⁴⁵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2。

⁴⁶ 彭邦疇在〈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記云：「歐陽介卿(榮)中翰嘗屬王霞九(贈芳)侍御就都下訪求善本，將付諸梓，尋借得翰院本鈔錄。功未竟而霞九出守山東。歲辛卯(道光十一年)，霞九馳書索觀予家所藏，因別錄一通，更借翰院本審校。」(頁1)王贈芳在〈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亦記云：「贈芳供職史館，借得翰苑鈔本與諸同人分冊繕錄，旋以視學荊楚，未及卒事。……彭文勤公遺有鈔本，〔歐陽榮〕因致書春農(彭邦疇)學士合翰苑本校之。」(頁1)歐陽榮在〈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則記云：「於是〔王霞九〕觀察借得〔《瀛本》此處有闕字〕內府度閣本與同人倩工分鈔之，旋以督學楚北，未竟也。又謀諸彭春農學士出其祖文勤公知聖道齋本，合翰院本校錄郵寄。」(頁1)彭、王二人皆說借的是翰院本，但歐陽榮則記所借是內府度閣本。筆者以為三人所敘述的是同一件事，故所說原來欲借鈔的本子應該是同一本子。

⁴⁷ 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2；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2；歐陽榮：〈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頁1。



的底本。彭本由眾人依照宋版影刻的影宋本鈔錄而成。不過，彭元瑞在題記裏只說舊鈔本是購自吳縣商販。這樣重要的善本，歐、彭二人對其背景和資料來源等情況卻所知略少。《瀛本》卷末的〈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後有彭邦疇的案語說：「知聖道齋鈔本後載此序，係塗改未定之草稿，末佚去其半篇。」「遂莫考其人也」。筆者在本文的注¹⁰據陸心源在《皕宋樓藏書志》收錄的〈宋氏手跋〉，證明此篇的作者應是藏書家宋賓王。故彭本的前身正是《周益公集》知聖道齋本，而為此鈔本作校訂和撰寫跋文的人也就是宋賓王，而跋中談及的，誠如歐陽棨的案語言：「大旨蓋言其鈔本合顧〔夏珍〕、王〔聲宏〕二本參校而成。」⁴⁸

武陵顧夏珍以清河張鴻聲、沛國朱端揆所藏的不全本為底稿，親手鈔成《周益公集》十本，每頁凡十三行廿四字，每本約一千二百餘頁，共有七十三卷，其中包括《省齋文稿》、《平園續稿》、《玉堂類稿》、《歷官表奏》及《親征錄》等著作。清初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有抄帙全部，而抄帙後歸吳郡收藏家王聲宏。宋賓王在康熙壬寅（元年〔1662〕）春校訖《吳都文粹》時，從吳郡書賈得悉王聲宏欲借校《吳都文粹》。為了達成顧夏珍補闕訂謫這七十三卷文稿的心願，宋賓王遂以《吳都文粹》贄敬王聲宏。宋賓王不但因此可以借得《益公全集》，還在錢方蔚、謝浦泰、金星輅等人的協助下，將全集與顧夏珍鈔得的七十三卷相互訂正。「印抄時，間有訂正不下百餘處」，終在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鈔校成全集兩部。⁴⁹

參考《皕宋樓藏書志》記載宋賓王〈手跋〉後附錄的四條資料，雍正元年至六年（1728）期間，宋賓王繼續利用訪尋得的其他鈔本和周必大的傳記資料來校正鈔成的全集。雍正甲辰（二年〔1724〕）閏四月，宋賓王向朱端揆借得明朝萬曆廿七年（1599）由胡廷宴耗資刻成的《益公文選》來校正全集。雍正三年（1725）春，宋賓王與黃齊卿過吳慎修齋頭，有機會翻閱《南北宋相眼》（又名《宋相譜》）所載的《周文忠公相眼》。明朝崇禎（1628–1644）年間，吳長卿震元集合黃道周（1585–1646）、董其昌（1555–1636）、陳繼儒等數十位名臣之力，編撰《南北宋相眼》。不過，當時是書「募刻未成，聞名莫覯」。宋賓王「後獲借校，為益良多」。是年立秋後，文集校訖於瑯琊萬卷樓之西廡。雍正六年（1728）春，宋賓王又借得「孫慶真所得錢氏藏本，凡二十冊，中間雖有差誤，然為益多矣」。雍正七年（1729）校訖。⁵⁰

⁴⁸ 〈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頁2。

⁴⁹ 〈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附錄卷五後，頁1；《儀顧堂題跋》卷十二，頁2下（總頁143）；《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宋賓王〈跋〉，頁12下（總頁962）；同卷，宋賓王〈跋〉與謝浦泰〈跋〉，頁13上至15上（總頁963–64）。

⁵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別集類十九〉，宋賓王〈跋〉，頁14下、15上（總頁963，964）；《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上·宋別集類〉，頁57。

從上文的討論，可見彭元瑞購得的全集，正是宋賓王等人利用多種卷數不齊的鈔本和周必大的資料來校正的《周益公集》知聖道齋舊抄本。除了內部的證據，筆者也檢得外部的證據。據陸心源《儀顧堂題跋》的記載，宋賓王抄校完成的兩部全集，「一歸文瑞樓，今歸豐潤丁氏；其一今在陌宋樓，後有賓王四跋」。⁵¹ 宋賓王為全集撰寫的跋正見於《陌宋樓藏書志》。據宋賓王的跋，他大概在雍正七年後結束校正和補闕文集的工作。據謝浦泰〈跋〉的記錄，全集在雍正十一年正式編校完畢。雍正十一年後，宋賓王校正的《周益公集》知聖道齋本在三十多年裏轉輾間從陌宋樓落到吳郡的商賈手中，終於在乾隆三十六年由彭元瑞購得。⁵²

彭元瑞在乾隆五十五年曾借內府本來校證所購得的知聖道齋本。王贈芳在《瀛本》的重刊後序裏曾經指出「益公所著號《平園集》者，多至二百卷，今藏內府」。彭邦疇在道光重刻本的序中提到南宋原刻本「自宋至今迄少傳刻。四庫所收其別本存翰林院中」。⁵³ 這就是說在道光十一年，歐、彭等找尋第三鈔本輔助編校周必大集時，因王贈芳供職史館而借得存放於翰林院的鈔本，即《庫本》的別本，用以與彭本合校。換言之，翰林院本就是鈔入《四庫全書》的《文忠集》，它與彭元瑞借得內府本皆是官方所藏的周必大集的舊鈔本。從他們撰寫的序和題記來看，他們皆以官方所藏的鈔本為校證的主要參考本，這便充分反映了被視為另一主要使用版本的《庫本》的價值。

上文曾提到，歐陽棨重刊周必大全集時用以進行校訂工作的主要鈔本便是翰林院本。彭邦疇在重刊序中亦說「四庫所收其別本存翰林院中」。換言之，《庫本》，即《文忠集》鮑氏家藏本，也就是《瀛本》的主要參考本。現筆者依照上文的敘述，將藏書家所藏鈔本的流傳過程和這些鈔本跟《庫本》與《瀛本》的關係，製成下圖。

《庫本》與《瀛本》的比較

版式的不同

《庫本》是官方集合全國優秀人才和物資修纂的官刻本，而《瀛本》是歐陽棨等耗資刻印的家刻本。版式方面，二者自然有明顯的分別。清高宗修纂《四庫全書》時，清朝國勢仍處於隆盛階段。清廷展開全國性搜求宋、元以來的古籍和遺書的活動，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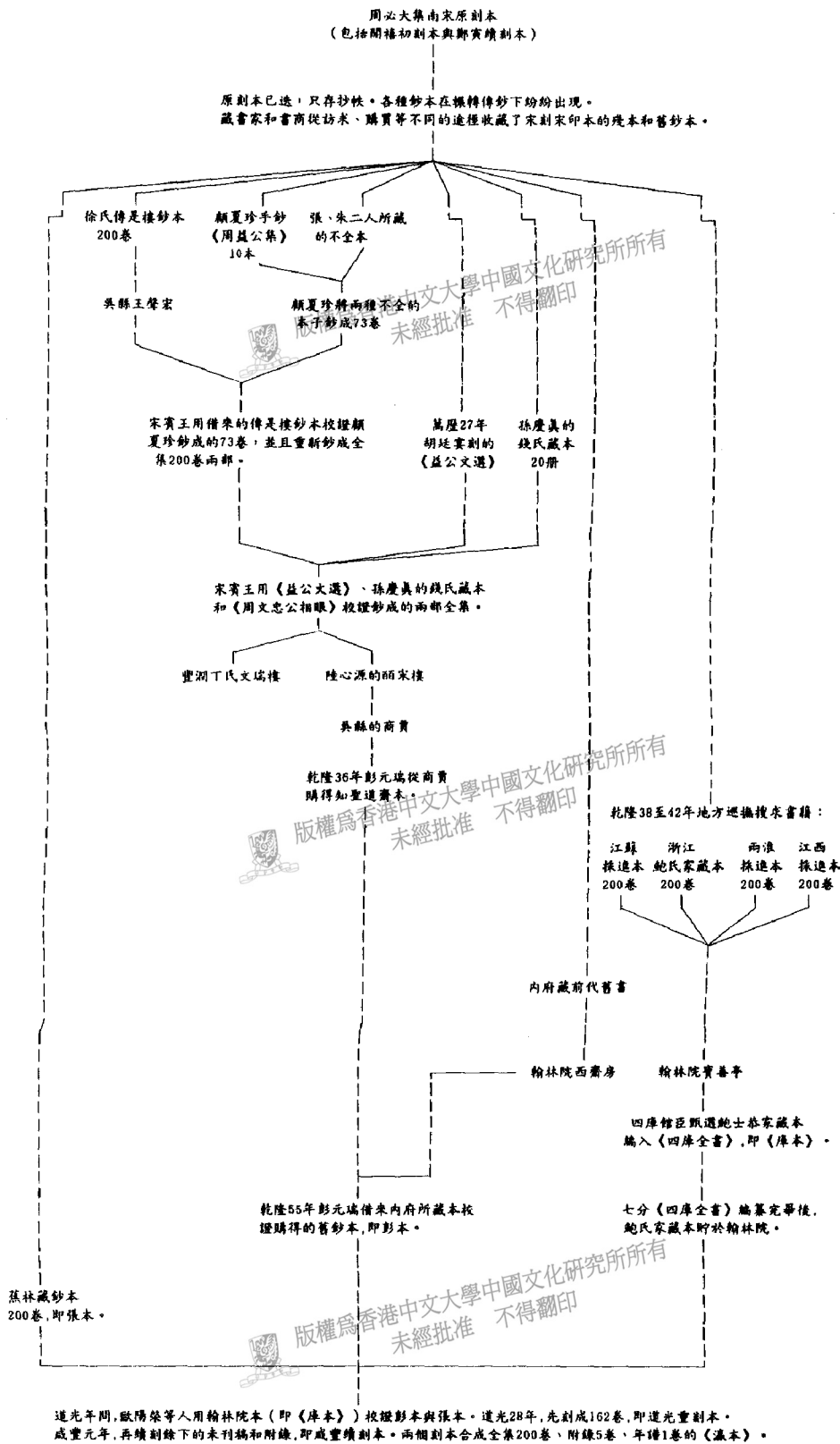
⁵¹ 《儀顧堂題跋》卷十二，頁2下（總頁143）。關於文瑞樓那鈔本的下落，筆者僅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記錄了「《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年譜一卷宋周綸撰，附錄五卷清金氏文瑞樓抄本三十二冊」。見〈集部上·宋別集類〉，頁57。

⁵² 關於彭本的編校過程，可參周蓮弟：〈彭元瑞藏知聖道齋本《周益公集》編校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1期（2000年1月），頁54-58。

⁵³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頁1；彭邦疇：〈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頁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

周必大集版本流傳圖



國家優秀的人才挑選善本，然後設置總裁、總纂、纂修等官，編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選用浙江上等開化榜紙，事先印好直行紅格，又名朱絲欄。紙張規定每半頁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書版四周雙欄，注文則用雙行小字。各書均先錄四庫館臣為該書所撰的提要，再錄正文。每頁版心的框線下清楚題寫「欽定四庫全書」，版心中央，魚尾之下分別注明書名和卷數，而版心的右下方則注明頁數。字體方面，康熙（清聖祖，1654–1722，1661–1722在位）、雍正（清世宗，1678–1735，1722–1735在位）以後，覆刻宋元本之風盛行，刻書喜以精楷上板，即清初被稱為軟體字，與宋體字相對。影響所及，《四庫全書》所鑄的銅活字，也採用了筆劃流麗生動的軟體字。⁵⁴

不過自乾隆末年以後，清朝國勢江河日下，內府刻書事業逐漸萎縮，編刊的書籍在寫刻、印刷、紙墨、裝幀各方面都不如往昔。道光、咸豐時期，國家經濟衰竭，財力匱乏，編修書籍的數量大減，甚至要降低官員和工匠的辦事公費來節省開支，維持修書處的經營。《瀛本》是道光廿八年到咸豐元年期間由私人自費重刻的家刻本。從搜集善本、校訂闕訛、校對文字、編纂原文到刻印刊行等工作，都依賴歐陽榮等人匯聚的力量和資金；又遇上清中葉以後衰落的社會經濟環境，故此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人力、紙墨工料兩方面都自然難以跟乾隆朝編纂的《四庫全書》媲美。⁵⁵

《瀛本》的書名以姓名相稱，即「周益國文忠公集」。裝幀方面，全書採用線裝形式，前後各加一書皮，然後打眼穿線，裝訂成冊。書衣的左上黏上書籤，書籤上寫上書名、卷數和冊數。書前印有封面，封面分三行，中間刻有書名「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字體較大。右行上方是刻印年，刻上「道光二十八年鑄」。左行下方是藏板者，刻上「瀛塘別墅藏板」。版式上，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四字，注文雙行小字，每行二十三字，頂格二十四字，書版左右兩邊雙欄白口。由於全書採用線裝，書口即書版中央的版心部位朝外。書口上方刻有全集名稱「周益國文忠公集」，中央刻有書名和卷數，下面是頁數。上欄與天頭相距六十二公分，下欄與地腳相距二十四公分。字體方面，為了便於寫刻和清晰易辨，歐陽榮重刻周必大集時採用了橫細豎粗、方正呆板的宋體字，即硬體字，世稱匠體。⁵⁶

結構的異同

結構上，修纂數以千計書籍的《四庫全書》在體例上力求簡單劃一。《瀛本》是家刻本，全集的結構不受集體編纂的規格限制，因而流露了私刻本在體例上多元化的特色，

⁵⁴ 《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王鍾翰〈序〉，頁4；《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140–41；《校讎廣義》，頁351–52。

⁵⁵ 《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清代內府刻書概況》，頁529–36；《校讎廣義》，頁195。

⁵⁶ 《校讎廣義》，頁195–96，251–52；《版本學》，頁65–91。

更可以突出編校者刻印是書的目的和志願。茲將《庫本》與《瀛本》在全集結構上的異同以表列方式說明：

《庫本》與《瀛本》全集結構的異同

庫本	總卷數	瀛本	總卷數	備注
		《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目錄	卷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首	《四庫提要·文忠集》	同上	
陸游《文忠集》原序	同上	張敦仁《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序》	同上	
		彭邦彜《重刊周益文忠公集序》	同上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	同上	
		歐陽榮《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敘略》	同上	
		《彭學士原定凡例》	同上	
		歐陽榮《重刊凡例》	同上	
		《宋史本傳》	同上	《庫本》將本傳置於年譜後
		《南宋書本傳》	同上	
		《宏簡錄宰輔列傳》	同上	
周綸《年譜》1卷	同上	周綸《年譜》1卷	同上	
《宋史本傳》	同上			
		《周益國文忠公集》總目	同上	道光重刊本的總目列出《省齋文稿》至《承明集》共162個卷目
		陸游《省齋文稿序》	同上	跟《庫本》附載的陸游《文忠集原序》相同
		《省齋文稿》目錄		
《省齋文稿》40卷	1-40	《省齋文稿》40卷	1-40	
徐誼《平園續稿序》		徐誼《平園續稿序》		
		《平園續稿》目錄		
《平園續稿》40卷	41-80	《平園續稿》40卷	41-80	
		《省齋別稿》目錄		



庫本	總卷數	瀛本	總卷數	備注
《省齋別稿》10卷	81-90	《省齋別稿》10卷	81-90	
		周必大〈詞科舊稿自序〉		
		《詞科舊稿》目錄		
《詞科舊稿》3卷	91-93	《詞科舊稿》3卷	91-93	
		周必大〈掖垣類稿序〉		
		《掖垣類稿》目錄		
《掖垣類稿》7卷	94-100	《掖垣類稿》7卷	94-100	
		周必大〈玉堂類稿序〉		
		《玉堂類稿》目錄		
《玉堂類稿》20卷	101-120	《玉堂類稿》20卷	101-120	
		《政府應制稿》目錄		
《政府應制稿》1卷	121	《政府應制稿》1卷	121	
		《歷官表奏》目錄		
《歷官表奏》12卷	122-133	《歷官表奏》12卷	122-133	
		《奏議》目錄		
《奏議》12卷	134-145	《奏議》12卷	134-145	
《奉詔錄》7卷	146-152	《奉詔錄》7卷	146-152	
		《承明集》目錄		
《承明集》10卷	153-162	《承明集》10卷	153-162	咸豐續刊本在《承明集》卷後編入一篇續刊敘略的文章，一篇續刊凡例和一個舉列163至200卷，附錄5卷的目錄
		《雜著述》23卷，包括：	163-185	《庫本》沒有用《雜著述》這篇目包括下列23卷文稿
《親征錄》1卷	163	《親征錄》1卷	163	
《龍飛錄》1卷	164	《龍飛錄》1卷	164	
《歸廬陵日記》1卷	165	《歸廬陵日記》1卷	165	
《閒居錄》1卷	166	《閒居錄》1卷	166	
《泛舟游山錄》3卷	167-169	《泛舟游山錄》3卷	167-169	
《乾道庚寅奏事錄》1卷	170	《乾道庚寅奏事錄》1卷	170	
《乾道壬辰南歸錄》1卷	171	《乾道壬辰南歸錄》1卷	171	
《思陵錄》上下2卷	172-173	《思陵錄》上下2卷	172-17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

83

庫本	總卷數	瀛本	總卷數	備注
		《四庫提要·玉堂雜記》		
		周必大《玉堂雜記序》		
《玉堂雜記》上中下3卷	174-176	《玉堂雜記》上中下3卷	174-176	《玉堂雜記》以單行本修入《四庫全書》時，館臣甄選了鮑氏家藏本 ⁵⁷
		《四庫提要·二老堂詩話》	174-176	
《二老堂詩話》上下2卷	177-178	《二老堂詩話》上下2卷	177-178	《二老堂詩話》以單行本修入《四庫全書》時，館臣甄選了江蘇巡撫採進本 ⁵⁸
《二老堂雜誌》5卷	179-183	《二老堂雜誌》5卷	179-183	
《玉蕊辨證》1卷	184	《玉蕊辨證》1卷	184	道光重刊本沒有錄入是書的提要；是書以單行本修入《四庫全書》時採用了內府藏本 ⁵⁹
《近體樂府》1卷	185	《近體樂府》1卷	185	道光重刊本沒有錄入是書的提要；是書收入《四庫全書》時，館臣甄選了安徽巡撫採進本的單行本 ⁶⁰
《書稿》15卷，包括：	186-200	《書稿》15卷，包括：	186-200	
《書》3卷	186-188	《書》3卷	186-188	
《筍子》11卷	189-199	《筍子》11卷	189-199	
《小簡》1卷	200	《小簡》1卷	200	
《附錄》5卷		《附錄》5錄		
		《記鈔周益國文忠公集始末》		

從上表可見，各種書稿的排列次序上，《庫本》與《瀛本》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四庫提要·文忠集》記載，「茲集所載，則依原書編次以存其舊」。⁶¹換言之，《庫本》

⁵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九〈史部·職官類〉，頁683。

⁵⁸ 同上注，卷一百九十五〈集部·詩文評類〉，頁1787。

⁵⁹ 同上注，卷一百一十六〈子部·譜錄類存目〉，頁1002。

⁶⁰ 同上注，卷二百〈集部·詞曲類存目〉，頁1830。

⁶¹ 《四庫提要·文忠集》，頁2上(總頁2)。

內各種書稿的編次是依照鮑士恭家藏本的序列，而《瀛本》的編次與《庫本》亦無大異，這便可推知這兩版本的編次與周綸的編次大抵相同。不過，參考上表對照兩版本的情況，筆者仍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幾點差別：

一、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時，為了節省資源，大多把原書的子目、序、跋等資料削去。⁶²《庫本》在《文忠集·四庫提要》後，除了收錄陸游撰的〈《省齋文稿》序〉，以及在《平園續稿》前載入徐誼撰的〈序〉，其他周必大為書稿寫的自序都給刪去。《瀛本》是由歐陽棨等人重刊的家刻本，為了解釋重刊的背景和目的，編纂者都將重刊和續刊的序、後記等文章錄入全集，敘述編纂過程和鈔本來源。編輯時，《瀛本》的編者把《四庫全書》的提要置於首位，以表示尊重四庫館臣的評論，次及作者或他人為是書撰的序，再及目錄，最後才是正文。

二、《庫本》沒有目錄。《瀛本》是匯合三大鈔本編校成書的家刻本，不受集體編纂規則的限制。為了方便檢閱，《瀛本》編校者不但在全集的卷首設置總目，還在十本篇幅較長的書籍的卷首設目錄。〈續刊彭學士原定凡例〉說：「以文集之名作大綱，統為二百卷。內分諸種，各自為卷，諸卷各自為體。綱下有目，目下有子目。」⁶³

三、《庫本》由四庫館臣直接將甄選的版本纂抄入《四庫全書》，不會更改該書版本的編排。《瀛本》按照編校者的標準重新編纂，故《瀛本》必須載入彭邦疇為重刊本寫的凡例，還有後來因刻印未刊稿而需要在續刊本增入的未刊稿的凡例，俾便解釋重刊本和續刊本的編撰體例和編校者對一些書稿進行修訂的原因和修訂情況。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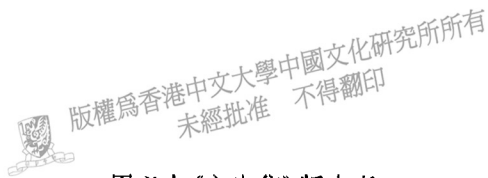
《瀛本》在道光末年由私人合力編纂成書，無論在資金、人力、物力等條件上都不及乾隆朝由官方編修的《四庫全書》雄厚，其刻印本的品質也自然不及《庫本》精良。從文稿的編輯而言，《庫本》正文內的一些篇目下往往附注篇章的撰寫日期，而《瀛本》的篇章則沒有錄入日期，或是將正文篇目下的日期改附注於目錄內的篇目之下，不錄入正文。正文的格式上，《瀛本》的篇目於每行第三格起題，而正文全部頂格。《庫本》的篇目在每行的第五格起題，正文基本上全部頂格；若文章是策問等考試題目，則問題的第一行頂格，正文從第二行到最後一行，每行皆低一格，眉目較清晰易辨。

《瀛本》的優點則主要見於校訂錯誤和輯補闕文兩方面。是本運用了三大舊鈔本編成巨集，不但校訂了《庫本》在文字上的錯誤和篇章重覆出現的情況，更利用了張本和彭本，輯補了不少在《庫本》內闕失的篇章，並在補闕後附注解釋補闕的資料來源和補闕過程。這些鈔本無疑可以補充《庫本》闕失的資料。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又主要討論兩版本的背景與二者的關係，故筆者不在此舉列說明。《瀛本》所用的鈔本

62 《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140—41。

63 《瀛本》卷首〈彭學士原定凡例〉，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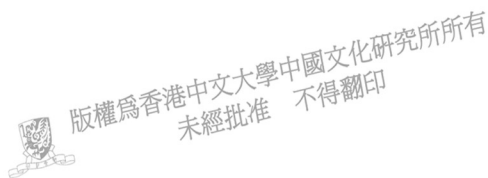
64 《瀛本》，《承明集》卷後，〈續刊彭學士原定凡例〉，頁1。



周必大《文忠集》版本考

85

都是成於眾人之手，在編校不同鈔帙和殘篇下纂修成集，錯誤無可避免。《庫本》是四庫館臣從諸種採集自藏書家家藏的鈔本中甄選出來，是當時館臣認為較佳的版本，而《瀛本》也借用此本為校證其他鈔本的主要參考本，故《庫本》依然不能為《瀛本》完全取代。總括而言，兩個版本各有優點。從卷數、內容、文字等方面而言，兩本都是現存資料可靠、宜於作為研究用途的版本。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ou Bida

(A Summary)

Chau Lin Tai

Zhou Bida 周必大 (1126–1204) was an eminent scholar-official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1126–1279). He served in the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under emperors Gaozong 高宗 (1107–1187, r. 1127–1162), Xiaozong 孝宗 (1127–1194, r. 1163–1189) and Guangzong 光宗 (1147–1200, r. 1190–1194). During his lifetime, Zhou Bida had a long tenure in the Hanlin Academy and the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and also served as either a companion or a classical tutor to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es. He had work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and 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 and was even promoted to the post of Grand Councilor in 1187.

His long service and rich experience enabled him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court affair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He had written numerous essays and drafted imperials edicts concerning royal court and policies that were implemented in the country. As such, his large amount of writings in different varieties deserves close attention. During the Kaixi 開禧 (1205–1207) reign, his son, Zhou Lun 周綸, took up the arduous task of editing and printing about two-third of his father's manuscripts. The remnants were later printed by Zheng Zijing 鄭子敬 (?–1237). They are altogether two hundred *juan*, with five appendices and a chronology of his life. The original printing plate made in the Kaixi reign was unfortunately lost. Such a huge set of collected works, however, had never been printed till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ough Zhou's writings were copied and circulated by generations, most of the copies were either incomplete or were fragments of the older texts.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complete set of Zhou's collected works, which both contain 200 *juan* and are kept in a good condition.

1. *Wenzhong ji* 文忠集 in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in 1986.
2. *Luling Zhou Yiguo Wenzhong Gong ji* 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 in *Yingtang bieshu* 瀛塘別墅 edition, which includes the main collection printed in 1848 and the remnant collection printed in 1851.

These two versions are differentiated in ways of editing, copying and printing. The sources of these versions, which might be either a whole set or just remnants of the older texts, were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private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Zhou Bida was a distinguished scholar-official; his writings on both court affairs and various policies contribute immensely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ong.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o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versions of Zhou's writings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m.